

沈志佳 劉 靜 主編

*Lush Leaves Blossoming Flowers*  
*Newly Cataloged Chinese*  
*Ancient and Rare Books*  
*at UW and UBC*

# 花 葉 婆 娑

華盛頓大學和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古籍珍本新錄

下 冊



中 華 書 局

沈志佳 劉 靜 主編

*Lush Leaves Blossoming Flowers*  
*Newly Cataloged Chinese*  
*Ancient and Rare Books*  
*at UW and UBC*

# 花 葉 婆 娑

華盛頓大學和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古籍珍本新錄

下 冊

中 華 書 局

六家文選卷第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志中

思立賦

立道也德也其作此賦以修道德志意不可遂願輕舉歷遠遊六合之外勢自不能義又不可故退而思自反其系曰回志竭來從立謀獲我所求夫何思思立而已老子曰立之又立衆妙之門平子時為侍中諸常侍惡直醜正危衡故作思立非時俗

張平子舊注

翰曰衡時為侍中諸常侍皆惡直醜正危衡故作是賦以非時俗思

立者思立遠之德而已善曰未詳注者姓名擊流別顯云衡注詳其義則甚多踈略而注又稱愚以為疑辭非衡明矣



#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圖書館 中文古籍與特藏

武亞民 劉 靜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簡稱UBC, 又譯為“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或“卑詩大學”) 位於加拿大西部通往亞太地區的門戶城市溫哥華, 是北美的漢學研究重鎮之一。其亞洲圖書館於1960年建館伊始, 就確定了以中國研究為中心的文獻收集政策。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積累, 和前輩同仁的不懈努力, 及私人藏書家的慷慨捐贈, 目前中文藏書已達到三十餘萬冊, 是加拿大西部最大的中國文獻中心。尤為珍貴的是其中六萬餘冊中文綫裝古籍, 在北美地區的東亞圖書館中, 是數量大、質量高且頗具特色的重要收藏。這批珍貴的古籍不僅為本校的中國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也隨着對其越來越深入的整理和揭示, 不斷吸引世界各地的研究學者和國際合作夥伴。在過去的兩年, 由美國梅隆基金會 (Mellon Foundation) 和圖書館信息資源委員會 (Council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縮寫為CLIR) 提供經費支持, UBC亞洲圖書館聯手美國華盛頓大學 (UW) 東亞圖書館以及北京大學 (PKU) 圖書館, 對館內積壓多年的十幾種專藏的近萬種中文圖書進行了清理, 並挑選出1200種十分珍貴的、在北美地區甚至海內外都罕見的圖書進行了詳細的編目, 正式納入館藏。其中既包括中文古籍善本, 也包括民國時期的書刊, 使館藏中文藏書的質量大幅提昇。CLIR項目已經於2016年5月結束, 這些書也開始為教學與研究服務。

近年來, UBC亞洲圖書館把建設有特色的中文藏書資源作為新的工作重點, 並已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同時也面臨諸多困難。本文將重點討論, 我們是如何在經費和人才緊缺的困境中尋求國際合作、深入開發特色資源的。我們將以剛完成的CLIR項目為例, 來展示如何在以西文為主的學術環境中, 探索和發展有特色的中文藏書資源建設的道路。

## 一、中文古籍的來源、構成及特色

UBC亞洲圖書館的中文古籍有兩個主要來源, 即購買和捐贈。學校通常沒有固定的預算來發展中文古籍館藏, 必須尋求特殊的渠道, 如接受捐贈或者申請一次性的特殊經費。相對於北美地區其他歷史較久遠的東亞圖書館來說, UBC亞洲圖書館的起步較晚, 1960年纔正式建館。

從建館伊始，其中文藏書的建設就緊密圍繞本校亞洲學研究的需要，有計劃、有重點地從香港、澳門以及東南亞地區購買，這就決定了其中文古籍藏書的主體，在學科內容上有所側重，重點學科的藏書逐漸形成了比較完整和獨特的藏書體系。例如，蒲坂藏書是於1959年購自澳門，景頤齋和宋學鵬藏書於1966年購自香港，還有一些小批量的古籍來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港澳臺地區以及日本。每次購買都是補充藏書之不足，使藏書體系更加完善，更適合教學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溫哥華是先僑登陸北美大陸的落腳點，是加拿大華人移民的聚居地，不乏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名人之後，更是華人僑團活躍的地方。華僑先驅們不僅投資印刷少量的傳統中文古籍綫裝書，許多老華僑也保存有從原居地和遷徙地，如東南亞和日本等地帶來的中文古籍。他們慷慨的捐贈進一步強化了UBC亞洲圖書館的中文特色資源，不僅對保存和傳播中華文化起了巨大作用，同時也為研究加拿大華僑歷史提供了重要綫索。

蒲坂藏書於1959年由當時執教本校的何炳棣（1917—2012）教授代表UBC遠赴澳門購得，共計3200餘種，45000多冊，內容涵蓋經史子集各個方面。在此基礎上，UBC於1960年成立了亞洲圖書館（當時稱為亞洲部），次年設立亞洲研究系並開始廣羅全球的漢學家。蒲坂藏書的主人原是澳門的富商姚鈞石（1889—1973），他在1941年從舉家躲避戰亂至香港的藏書家徐信符（1879—1947）手中購買了一大批南州書樓的舊藏。自認為舜帝後裔的姚先生，以舜的都城“蒲坂”命名了自己擴充後的藏書為“蒲坂書樓藏書”。後來當姚先生有意出售這批藏書時，北美、香港、臺灣以及新加坡的幾家大學都有意購買，而最終被UBC奪得頭籌。為了能夠體現藏書的沿革，這批書到達UBC後，便被稱之為“蒲坂藏書”，從此“蒲坂藏書”便成為UBC亞洲圖書館中文古籍藏書的代名詞。這第一批大規模的中文藏書，奠定了UBC亞洲圖書館的藏書基礎，使該館的藏書在數量和質量上後來居上，在當時的北美高校館中處於領先的前五名位置。據前輩館員謝琰先生回憶：1959年，蒲坂藏書在大木箱中運抵UBC時，被比作來自中國的長城，可想而知其規模之巨。這一採購整座中國私人藏書樓的做法，在海外實屬罕見。蒲坂藏書至今仍是UBC亞洲圖書館中文古籍藏書的主體，約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珍善本的數量過千，孤本逾百，最早的版本是元刻本，明刻本和清初刻本更是俯拾皆是，其中套印本、粵版書佔有一定比例，還有大量的批校本、精抄本和稿本。蒲坂藏書的內容特色之一，就是集中保存了廣東的地方文獻，基本上覆蓋了整個嶺南的珠江三角洲地區，這些藏書大多繼承自徐信符的南州書樓舊藏。在形式上，蒲坂藏書也是多種多樣，除了刻本、稿抄本外，還有部分拓本以及地圖等。

繼蒲坂藏書之後，UBC亞洲圖書館又陸續在香港訪得景頤齋陳氏藏書和學者宋學鵬的藏書。景頤齋藏書是原香港富商陳氏家族的藏書，主人是陳啓濂，其藏書約160種，4000多冊，以史部和集部為主，而且大套書較多。宋學鵬，名寶琳，字學鵬，其藏書多圍繞自己的研究興趣，手自批校，其中幾部廣東的方志非常重要，另外佛教書籍也比較多，其藏書共89種，約500冊。這兩批藏書雖然數量不大，但卻擴充了UBC亞洲圖書館藏書的學科覆蓋面，而且其中也不乏明清善

本書，特別是幾部清初內府編印的大套殿板書保存完好，尤為難得。

1997年，UBC圖書館又從原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館長Peter Swann手中購得一千多種有關東方藝術史的藏書，其中包含數百種二十世紀初用珂羅版影印的中國古代書畫集，如上海有正書局、神州國光社等影印的歷代名畫大觀等。中國古代名畫歷來都是藏在深宮內院，秘不示人，難得一見。但是到了清末民初，隨着清王朝的沒落和滅亡，許多珍品陸續從宮中散出，落入私人手中。當時西方的攝影技術在出版印刷業上的應用剛剛傳入中國，這種先進的攝影印刷技術正適應了對書畫複製的需求，使得這些名畫得以批量複製。雖然許多圖書館都或多或少地收藏有這類畫冊，但是如此完整的收藏並不多見。Swann專藏的這些珂羅版畫冊，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美術發展史的一個縮影。今天，這些名畫的原件有些已經失傳，有些則又被鎖入公私藏家的密室。而珂羅版畫冊，作為這些名畫的第一次影印本，就成為研究中國古代美術史的珍貴資料。Swann專藏的這些畫冊長期以來沒有被系統整理，在2015年的CLIR項目中，它被列為工作重點之一，目前大約有近百種比較稀見的畫冊已經完成整理。

除了有重點的採購之外，UBC圖書館還先後接受過幾次規模較大的私人捐贈，形成了幾個較有特色的中文專藏。早期的有司徒旄專藏和梁覺玄醫生專藏，近期的則有龐鏡塘專藏。

司徒旄（1889—1967）出生在加拿大的移民先驅家庭，靠自學通曉中國傳統文化，精通古典詩詞、繪畫，並且學貫中西，自由地交往行走於中西不同社群。司徒旄為孫中山的摯友，曾為辛亥革命爭取海外華僑的支持。他擔任加拿大太平洋鐵路麾下的遠洋輪船公司客務經理四十多年，交遊甚廣。民國早期的精英階層不乏他的朋友或者受他的關照。面對當年對華人的種族歧視，他據理力爭，甚至游說國會。而對於中國的天災人禍，他也始終在募集海外捐助的最前線。司徒先生一生積累藏書1100多種、2000多冊，內容主要是歷史、文學、佛學、書法等有關中國文化的書籍。在他1967年仙逝後，由女兒司徒美仙和女婿雷玉堂捐獻給UBC亞洲圖書館。

梁覺玄醫生曾經在香港、美國和加拿大行醫，是第一位在溫哥華開設中醫診所和學校的中醫師。他為北美的針灸合法化奔走呼籲，可謂中醫在北美大陸立足的拓荒者。他身後留下的140餘種中醫古籍和手稿尤為珍貴，其中不乏稀見之本。

龐鏡塘專藏由其家人輾轉從中國大陸帶至臺灣，又從臺灣帶至溫哥華，並最終捐贈給UBC圖書館。龐鏡塘（1900—1977），山東荷澤人，生長於官宦世家，喜愛收藏古書和名人字畫，藏書多達9萬餘冊，其中有不少珍本秘籍。1925年，龐參加國民革命，曾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長、國民黨山東省黨部主任委員等職。1948年濟南戰役時，龐鏡塘被解放軍俘虜，其妻楊寶琳攜帶兩女及貴重物品，包括部分藏書、字畫等赴臺。楊曾在臺灣擔任“立法委員”，去世後，其女龐禕將遺留下來的藏書字畫等帶到溫哥華。龐禕曾就讀於UBC的亞州研究系，她於2000年去世後，其子方志豪（Paul Fang）主動聯繫UBC圖書館，將母親保存的龐鏡塘的部分藏書和碑帖拓片捐贈給亞洲圖書館，圖書館給予了妥善保管與整理。方志豪及其姊妹

有感於圖書館員們對其捐贈品所做出的辛勤整理和揭示工作，以及圖書館良好的保存條件，於2014年再次捐贈，除少量善本、拓片外，還有字畫六十餘幅（軸）。兩次捐贈總計近兩百種、一千冊（件），包括古籍善本、碑帖拓片、名人手札及書畫扇面等，都是龐氏藏書的精華，其中許多是出自山東名家之收藏，包括著名的海源閣舊藏。由於這些藏品幾經輾轉，沒有得到妥善的保管，破損非常嚴重，內容也多有缺失。值得欣慰的是，其中有一部《史晨碑》拓本，因書冊斷裂為兩部分而分散在兩次捐贈之中，雖相隔十四年而終成完璧。

除此以外，UBC亞洲圖書館還經常接受一些小規模的捐贈，這些捐贈雖然數量不多，不足以形成專藏，但是許多贈品都別具特色，甚至捐贈者本身就值得研究。例如，本校的蔣北扶醫生捐贈的他收集了七十多年的華僑檔案以及少量的中文古籍，畢業於哈佛大學的民國經濟學家衛挺生後人捐贈的衛的著作和中文藏書等。這些最初收集於中國官宦世家和士大夫階層的珍藏，歷經劫難，遠渡重洋，最終彙聚於UBC亞洲圖書館，亟待開發利用。

## 二、中文古籍的整理、出版和數字化

正如多數北美高校的東亞圖書館一樣，UBC亞洲圖書館也面臨資金少和人手短缺等問題。沒有古籍整理的專門人才，大量的珍本秘籍一藏就是半個世紀。雖然先後也請過諸如王伊同、錢存訓、潘銘燊、李直方、馬泰來、沈迦、戴聯斌等專家學者進行短時間的梳理，但主要是集中在對善本的整理上，一直没能對中文古籍加以全面系統的整理、鑒定、編目和保護，尤其是採用機讀目錄後，許多入藏多年的古籍圖書並沒有被納入到機讀目錄當中，或者機讀目錄中揭示的信息不全面、不正確，使得這些藏書成為館藏的盲點，無法得到充分利用。

對於蒲坂藏書，姚鈞石先生本人曾編有《蒲坂書樓藏書目錄》，手稿本，共五冊，按照經史子集叢五大部類編排，各部類及其所屬小類之間均留有空葉，以備隨時增添。著錄項目有書名、作者、冊數、卷數、版本。UBC亞洲圖書館基本上按照這個目錄順序排架，後來又根據實際排架情況編製了書本式的書名筆畫索引，作為內部工作使用。

1959年蒲坂藏書抵達UBC後，當時負責接收和整理工作的王伊同教授，應海內外學者的請求，根據姚鈞石的目錄，選取其中的三百餘種宋元明刻本及抄稿本，整理編製出蒲坂藏書的善本目錄《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宋元明及舊鈔善本書目》。王先生在姚目的基礎上，檢核藏書，增加了行款、批注、鈐印等內容。此目錄雖然沒有正式出版，但也複寫了多部，分發給友人，後來又收錄到其論文集。不久王先生又用英文發表了較為詳細的介紹蒲坂藏書的文章，使蒲坂藏書在中西學術界產生了極大影響，至今人們仍然在引用或轉述王先生的文章或目錄中的內容，也仍然有學者按照目錄中的著錄查詢藏書。但是，王先生當時並沒有重新考證版本，只是照錄姚目的內容，而其中所列的宋元版書，經過後來專家學者的多次考證，除了丟失的幾部之外，能夠確定的只有一部元版書，即《晉書》。因此這部目錄雖然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但已經不能準確反

映蒲坂藏書的真實情況。

1991至1992年間，爲了加強對蒲坂藏書的保護，UBC亞洲圖書館決定爲蒲坂藏書投保，但是保險公司要求提供每部書的投保價值。爲此，圖書館特聘請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的錢存訓先生和香港城市大學的潘銘燊先生爲蒲坂藏書估價。潘銘燊先生親臨溫哥華，用了五個月的時間，逐一檢核藏書，在姚鈞石目錄的基礎上，修訂並編製出全新的蒲坂藏書目錄，作爲估價用工作目錄。錢存訓先生即根據此目錄逐一爲藏書做了估價，UBC亞洲圖書館最後以316萬美元的價值爲全部蒲坂藏書購買了保險。

這次估價工作的一個重要副產品，就是潘銘燊先生編製的全新的蒲坂藏書目錄。這個目錄雖然仍是以姚鈞石的目錄爲底本，但是潘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對蒲坂藏書的影響十分深遠，許多方面至今仍然在沿用。首先，爲蒲坂藏書分配了流水號碼，總計3244號。每種書一個號，叢書及多卷書按總題名計算，這是對蒲坂藏書的一次徹底清點，數字相對比較準確，這個號碼也被稱爲蒲坂號碼，被加入到書目數據中，至今還在使用。其次，對藏書的版本進行了重新鑒定，對版本項的內容作了全面的修訂，成爲後來UBC機讀目錄的依據。第三，著錄項目更加詳細，增加了裝幀形式、書品等特殊項目，還爲書名增加了韋氏拼音。第四，將所有書目信息輸入到計算機系統（DOS系統）中，使書目信息的修訂和使用更加方便，同時也使編輯出版蒲坂藏書目錄成爲可能。但遺憾的是亞洲館當時没能趁熱打鐵，書目的出版未能實現，功虧一簣，而這套目錄實際上就成爲了蒲坂藏書的典藏目錄，目前使用的兩部內部用工作目錄都是從這個目錄打印出來的副本。這套目錄的不足之處是對每種書的卷數和冊數沒有清點核實，仍照錄姚目的數字。

在估價投保工作進行的同時，UBC亞洲圖書館還積極參加了由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RLG）發起的“中國古籍善本書國際聯合目錄項目”，該項目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的艾思仁博士主持。UBC一共提供了約1100條蒲坂藏書中的善本書目信息和書影。由於該項目是一個國際性的項目，各館提供的信息有機會相互印證，相互補充，尤其是書影的相互比對，明確了許多傳統鑒定上的不確定因素，使各館的書目信息都不同程度地得以修正，UBC也因此獲益匪淺。RLG項目的數據最初是在一個獨立的數據庫系統（RLIN）之中，2006年RLIN系統併入OCLC WorldCat，UBC的這些善本書目信息也因此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其後，亞洲圖書館又聘請李直方先生陸續將蒲坂藏書的其他部分編目並輸入到機讀目錄中。目前，90%以上的蒲坂藏書都可以通過機讀目錄查詢。相比之下，景頤齋、宋學鵬、龐鏡塘等藏書，直到2015年的CLIR項目，纔被編目整理並納入到機讀目錄當中。

在2014至2015年期間，UBC亞洲圖書館與UW東亞圖書館合作，成功完成了“發現近代中國——UW和UBC的中文典藏”項目。該項目是由梅隆基金會（Mellon Foundation）和美國圖書館信息資源委員會（CLIR）資助，目標是將兩館鮮爲人知的珍本秘籍編目共享，使它們可以被

全世界的學者瞭解和利用。該項目的成功申請，除了有兩館的精誠合作外，還得益於美國、加拿大、中國和歐洲的學者們的大力支持，從而使兩館能够在眾多的申請館中勝出，贏得寶貴的課題經費。因而也能够邀請國內頗有成就的專家前來，對兩館大量尚未整理的藏書進行鑒定，並挑選出有價值的藏書進行編目，為教學與研究服務。

PKU圖書館的姚伯岳教授作為CLIR項目UW中文古籍編目館員，於2015年1月開始在西雅圖進行為期17個月的工作。他還在2015年4—5月前來UBC擔任項目顧問。前遼寧省圖書館特藏部的武亞民老師，被聘為UBC亞洲圖書館的善本編目員。兩位知名的中文古籍專家，憑借其豐富的專業知識，對兩館尚未整理的藏書進行了整體的評估，鑒定並整理出兩千多種古籍善本、碑帖拓片及民國時期較為罕見的圖書，同時也為北美地區東亞圖書館界中文古籍工作提出了建議，對北美地區中文古籍編目條例的修訂提供了建設性意見。

本校的研究生也積極參與到該項目當中，他們在前期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清點和整理了數量巨大的未編圖書和檔案材料，努力發現有較高研究價值的，編製成稀見圖書清單，並對藏書的破損情況進行登記。後來，又為專家作助手，大大節省了專家的時間，保證了項目的順利完成。

在這個歷時近兩年的項目中，UBC亞洲圖書館共完成了對近萬冊未整理藏書的清點，挑選並整理出1200種價值較高的圖書，其中1912年以前出版的圖書佔80%以上。包括蒲坂藏書、景頤齋藏書、宋學鵬藏書、龐鏡塘藏書、部分Swann藏書，以及衛挺生、李樂天、梁覺玄等人的捐贈。其餘部分也將爭取早日進行整理，還希望能夠得到各方的大力支持。

在CLIR項目的推動和促進下，學校與總館都加強了對中文古籍保護工作的重視程度，但由於人員、技術、材料、經費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只能做些最基本的保護工作。從2016年5月起，開始實施了為中文古籍配置函套的項目，目前已經完成了近千個函套，同時對破損嚴重的古籍進行登記，為將來的修復工作做準備。

作為CLIR項目的一個意外收穫，就是UBC亞洲圖書館和UW東亞圖書館有幸成為“學苑汲古：高校古文獻資源庫(CALIS)”的首批海外成員館，在此我們要感謝PKU圖書館和CALIS管理中心以及姚伯岳教授。加入CALIS聯合目錄不僅使我們兩所大學的教授與學生能夠通過五十萬條在綫數據和二十七萬幅書影來利用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的館藏善本，同時也把我們兩校的中文古籍善本信息貢獻到資源庫中，分享給國內的學者。目前我館已經有四百多條數據及書影信息加入到CALIS中，還將陸續增加。

除了在北美地區尋求合作夥伴之外，我們也在積極參與並尋求與國內各個機構的合作，努力把我們有價值的藏書分享給國內的學者。前幾年我們主要參與了《廣州大典》和《海外廣東珍本文獻叢刊》等合作項目，提供了館藏中的幾十種孤本和珍本，並把數字化後的影像發佈到網上，提供免費閱覽。我們目前正在籌劃對館藏古籍中的稿抄本進行數字化，希望為全球的數字人文課題研究做出應有的貢獻，同時也期待與國內外的有關機構進一步合作。

### 三、中文古籍的利用情況

亞洲圖書館的中文古籍藏書，一直以來都是亞洲系教學與研究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也是海內外學者查詢的一個重要資源。但從使用的情況來看，大概可以看出一個波浪式的起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中文古籍藏書是圖書館藏書的主體，是教學、研究以及學生論文的主要資料來源，利用率比較高。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隨着中國大陸的對外開放，新印古籍、古籍的整理、校點、翻譯以及研究著作越來越多地入藏到圖書館；2000年以後，數字化古籍的逐漸興起與普及，使得古籍在內容上更加容易獲取，因此教授和學生對古籍原本的需求和利用有所減少。這一時期，對古籍原本的利用主要集中在特色藏書，即珍本、孤本、稿抄本等這些有特殊內容、特殊作者或特殊版本的藏書上面。近幾年來，對古籍原本的利用又有所回升，人們似乎又開始重視“書籍實體”的重要性。下面通過一些實例，來說明館藏古籍藏書的使用情況。

蒲坂藏書入藏帶來了UBC亞洲研究的興旺局面，除何炳棣、王伊同等史學教授外，葉嘉瑩教授也利用其中的文學典籍和大量的清人文集來教授中國古典詩詞。葉教授已經桃李滿天下，她的學生中又產生了幾代的教授，無論他們服務於哪所大學，仍然會使用蒲坂藏書。

葉教授的弟子、UBC亞洲研究系的施吉瑞教授(Jerry D. Schmidt)在研究清代鄭珍(1806—1864)詩集的過程中，發現現代出版的鄭珍詩集除校勘有誤外，往往刪除了作者本人的序文，而蒲坂藏書中的《巢經巢詩抄》則保存了作者的自序及其好友莫友芝、翁同書等人的序跋。因此他認為，蒲坂藏書中的《巢經巢詩抄》至今尚不能被重印的新版本取代。

由UBC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領銜的一個課題組與法國法蘭西學院的魏丕信教授合作研究丘濬的《大學衍義補》，該書為中國古代經世思想的名著，對明代以降的中國甚至歐洲的經世思想均產生過影響。課題組的戴聯斌博士發現蒲坂藏書中的版本與眾不同，將它與所有傳世版本進行了比對，最終確定蒲坂所藏是福建坊間翻刻明嘉靖三十八年(1599)吉澂刻本，對課題的研究有很重要的價值。音樂系的Alan Thrasher教授在2016年出版有關曲牌的書時，也利用本館古籍，如《白石道人歌曲》。

近些年來，由於數字化古籍的逐漸普及，古籍內容的獲得相對容易，而對古籍的感性認識越來越少，許多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老師和學生甚至從未接觸過古籍實體。有鑒於此，亞洲學系阮思德教授(Bruce Rusk)專門在善本特藏部安排了一次關於《詩經》的實踐課，他從古籍藏書中挑選出十幾種不同時期、不同版本的《詩經》，指導學生們如何去認識古籍、閱讀古籍，通過觀察版式、行款等來發現不同版本是如何突出或削弱經文及注釋的。阮教授說：“當學生們意識到他們在面對一部，比如說，被幾百年前另一位學生閱讀、劃重點、注釋，或者可能拿來為應付考試而研讀過的古籍的時候，他們確確實實感受到了與過去的聯繫。雖然古籍中相同的詞句已經可見於現代的印刷版本，在很多情況下，此類古籍的存在對學生以及高級學者而言仍然都十分重要。”學生們對此也都十分感興趣，反應非常積極。而錄取自PKU和美國的博士生

們從本館特藏和未編書的項目中不斷有驚喜的發現，並且到國際會議上宣讀他們的考證研究成果。例如，亞洲研究系的韋胤宗寫成了論文《作為作者的出版商：明清古籍形式所產生的意義》。除本校的師生外，也有北美、歐洲以及中國大陸及港臺的學者查詢和使用我們的藏書。英國牛津大學查找有關廣東沿海軍隊設置資料、軍用地圖等，專程到館使用《廣東清代檔案錄》《駐防廣州小志》。普林斯頓大學的馬泰來博士需要參考《閩中十子詩》，他認為1886年的版本雖然不被看作善本，但它比明代的版本更有使用價值。PKU的潘建國教授在研究明代鄧志謨時，找遍了中國和日本也沒能找到萬曆年間刻印的《蟬吟稿》，而最終在蒲坂藏書中找到了此書的唯一存世孤本。也有學者委託加拿大的朋友代為查詢，如麥吉爾大學的方秀潔教授代國內學者查問惲敬的各種版本《兼塘詞》。更有學者從亞洲飛來UBC查閱所需資料，如廣東學者親赴溫哥華查詢溫子顯傳世的唯一抄本《倚銅琶館詞鈔》。來自安徽的管錫華教授在UBC作訪問學者期間，對館藏清代嶺南著名詩人黎簡的手稿殘本《五百四峰堂詩稿》作了深入研究，輯錄出黎簡自刪詩十九首，對黎簡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 四、中文古籍的修復與保護

古籍修復與保護工作是圖書館古籍整理工作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古籍開發與利用的重要保障。但是，在加拿大乃至中國大陸及港臺以外的地區，中文古籍修復的技術和人才都十分短缺，甚至根本沒有。長期以來，UBC亞洲圖書館的中文古籍修復與保護工作都是處於若有若無的狀態，直到最近幾年來纔剛剛起步，但也只能做些簡單的保護和登記工作，連最基本的修補也做不到。總館有一名文獻保護員，雖然對中文古籍的保護也非常重視，但對中文古籍保護的知識與技術瞭解不多，只能在宏觀上做些相應的工作，許多具體的實質性工作尚無法展開。

蒲坂藏書自落戶UBC以來，首二十年是在總館（舊館）的地下室，後移至地上樓層，中間三十年是在目前亞洲圖書館的書庫中，至2013年始搬入總館新建的善本特藏庫。因此，前五十年都是在開放式書庫的自然環境下保存。溫哥華的氣候溫度不高、溫差不大，但是濕潤多雨，易滋生書蟲，而且中國傳統手工製作的紙張，吸濕性強，易老化。目前，蟲蛀的現象不是很嚴重，因為這些書在南州書樓或蒲坂書樓時，多數都經過重新裝裱，襯入了嶺南特有的萬年紅襯紙，對防蟲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紙張老化的問題相當嚴重，由於館舍的逐漸陳舊，通風、防塵等條件都達不到要求，甚至局部漏雨現象也有發生，因此書籍因受潮而老化的程度非常嚴重，在搬遷至新的善本書庫時，因為達不到善本庫的要求，一半以上的書都將函套撤掉，甚至將書衣、書底等部分頁面撕掉，嚴重者被放入冷櫃中保存，至今尚等待處理。而龐鏡塘藏書，在捐贈到UBC之前，就已經破損得相當嚴重，絕大多數無法提供使用。

據粗略的估計，UBC圖書館所藏的全部中文古籍中，大概有70%—80%的藏書有不同程度的破損，至少有20%左右的藏書破損嚴重，無法提供使用。因此，目前最大也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就是古籍的修復與保護。

古籍的修復與保護，是一項耗時、耗力的工作，投入大，見效慢。除了技術、人才等客觀因素外，還有認知上的差異。在國內，圖書館及其各級主管領導對古籍保護工作都非常重視，對人才的培養、經費的投入都十分支持。而在國外，各級決策者的意見很難達成一致。這是文化認知上的差異，因此，對我們來說，中文古籍修復與保護工作的開展，難度很大。我們一直在不斷努力爭取，也呼籲國內有識之士和有能力的機構，對海外中文古籍的修復與保護施以援手，把對海外中文古籍的修復與保護，納入到傳承和保護中華文化的大範疇之中，共同把中華文化的瑰寶發揚光大。

近年來，我們已經完成了將中文古籍搬遷至總館善本書庫的工作。總館善本書庫是一個現代化程度極高的書庫，具備可控的自然通風系統、溫濕度調控系統，可以保持恆溫恆濕，採用冷光燈、密集書架，防火、防塵、防光照等各方面都符合標準要求，二十四小時監控，保證安全。目前我們正在開展的工作還有，對破損古籍進行登記，為將來的修復工作做準備。對破損特別嚴重的古籍用無酸紙包裹，並貼上“紙張老化，不提供使用”的標籤，同時在機讀目錄的館藏項中也明確顯示“紙張老化，不提供使用”的信息，提醒讀者暫時不要借閱。另外，為沒有函套的古籍配置簡單的函套，等等。我們盡最大的努力去做我們能做到的事情，希望通過這些措施，來延緩中文古籍的老化破損的進度，為將來更有效地保護中文古籍起到一定積極作用。

總之，UBC亞洲圖書館將堅持把建設有特色的中文藏書作為藏書建設的重點，而中文古籍藏書則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文古籍的收藏整理、開發利用，以及保存與保護將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使中華文化的瑰寶在海外能夠不斷地傳承和發揚。



# 我們的藏書與我們的學術

韋胤宗

圖書館最核心的功用一為藏書，一為借閱。所謂“采集古今載籍，付之公開閱覽”，即為其意。高校圖書館，除了保存典籍之外，最顯著、最直接的功能就是供老師和學生教學、研究、學習之用，因此高校圖書館的館藏，往往能影響，甚至決定一所大學相關學科的研究水平。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亞洲圖書館和古籍特藏部收藏中文古籍約六萬冊，其中包括兩千餘種善本、一百餘種孤本，以及大量稿抄校本、金石拓片和書畫圖冊。這些收藏，使得UBC成為北美漢學研究的重鎮，對我們的學術生活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研究古代的文學、歷史、思想，閱讀古籍是基本功。而大部分的古籍都沒有點校本，因此直面古籍，瞭解古籍的版式、裝幀、行款等內容顯得格外重要。UBC亞洲系和歷史系的很多課程都安排有與古籍相關的實踐課，老師帶領學生去古籍特藏部，在老師和圖書館館員的指導下，學生們可以認識古籍，翻閱古籍。亞洲系副教授阮思德博士（Dr. Bruce Rusk）說：

UBC中文善本特藏對教學與研究來說一直都是極寶貴的資源。雖然我可以指出一部分對特定研究非常有用的特定古籍，但介紹我自己教學時對這些古籍的利用可能更有用處，因為這方面的價值長期以來都被低估了，即使是UBC的許多同事也是如此。實際上，這可以成為一個賣點，尤其是在吸引研究生參與我們古代中國的研究項目方面。

我曾帶領數個班級到UBC的善本特藏部上課，因規模所限，一直都是帶研究生或者高年級本科生過去。當然，學生們語言技能深淺不同，對這些特藏的利用程度也相應有所局限，但即使是對不能閱讀中文（更確切地說是大多數古籍使用的文言文）的學生而言，參觀實物本身亦可獲益良多。這些參觀過圖書館特藏的學生一直有積極的反饋，在班級評價中特別提到該次經歷，而且對基本館藏資源所涵蓋的研究內容有了更清晰的感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參觀包括選取與課程相關的古籍資料給學生們瀏覽的過程中，我本人也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驚喜，並有新的發現（至少對我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這批特藏沒有完整的編目，而目前旨在更新其目錄的項目將改善這一情況。但同時，這批特藏品類

豐富的特質，讓我們可以向學生們展示諸如印本、抄本、包含豐富的手寫批注的印本等實例。類似的，還有各種印刷和裝訂風格、形式的實例。這對幫助學生們瞭解過去人的讀書經歷大有裨益。例如，在一門關於《詩經》——一部中國古代的詩歌總集，後來成為儒家經典，並成為一個豐富的注釋傳統的主體——的課上，我們通過觀察版式、行款來看不同版本是如何突出或削弱《詩經》原文和各種不同等級的注釋，這使得從未見過此類文本的學生們——即使他們不懂中文——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這些文本是怎樣的複雜與多層次，這樣的觀感很難僅靠討論或者閱讀原文的翻譯來傳達。

最後，當學生們意識到他們在面對一部，比如說，被幾百年前另一位學生閱讀、劃重點、注釋，或者可能拿來為應付考試而研讀過的古籍的時候，他們確確實實感受到了與過去的聯繫。雖然古籍中相同的詞句已經可見於現代的印刷版本，在很多——儘管不是所有——情況下，此類古籍的存在對學生以及高級學者而言仍然都十分重要。我已經發現了幾本想要深入研究的古籍，例如一冊印鑒——看起來其收藏者搜訪有年纔積得衆印。其中部分印章蓋在書葉上，其他則蓋在散葉上，看起來就像一本剪貼簿。此類書籍因而成為有待決疑的社會交往與文化興趣的獨特遺迹。

如阮教授所言，在UBC古籍特藏部上過課的同學對那次經歷都印象深刻。亞洲系中國學的博士研究生高野實說：

我第一次親自接觸UBC藏的中文古籍，是在阮思德教授關於中國古代詩歌的課上。阮教授在古籍特藏部給我們上了一次特殊的課，讓我們接觸到了真真正正的古籍。我們甚至可以觸摸那些書，甚至翻閱數葉。那種翻閱的感覺還清晰地保留在我腦中，因為就是在那時我意識到了實物書籍的重要性——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只是關注文字本身而忽略了書籍的實物特性。我從古籍特藏部獲得的最大、最為印象深刻的收穫就是——閱覽和瞭解真正的古人使用和閱讀的書籍。

高野實提到了書籍的“實物性”，這也是我所感興趣的一個研究課題。我們知道書籍是一種特殊的物品，它除了承載思想、修辭借以呈現的語言文字之外，還提供了豐富的視覺造型信息。因為文字不可能憑空存在，它必須被書寫（或者印刷、雕刻、鑄造）到一定的物理材質上，纔能流傳；書寫的文字，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文本”，自然也必須以一定的字體書寫、以特定的行款排版。語言文字被書寫或印刷的過程，也是其視覺化的過程。一本書的“文本”能夠表達意義，其文本的“形式”當然也能表達意義。近些年的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理論家，如 D. F. McKenzie、Roger Chartier、Jerome J. McGann 等人，普遍認識到了文本視覺形式的表意性。

我有幸參與 CLIR 項目，2015年9月到12月在亞洲圖書館工作期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古籍書影資料，根據這些材料，寫成了論文《作為作者的出版商：明清古籍形式所產生的意義》(Publisher as the Author: Meanings Created by the Format of the Book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並有幸在卡爾加里(Calgary)舉辦的“2016 人文社科聯合大會”(Congres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中“書籍文化研究協會”(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Book Culture)第十二屆年會上發表。

2014年9月，我在亞洲圖書館發現了一幅刻於明萬曆十一年(1583)的世界地圖。該圖名為《九州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迹》，它繼承宋石刻《華夷圖》等中國古地圖的編繪傳統，以《大明一統志》為主要的數據來源，加入了萬曆初期的文化地理信息，並且可能是《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迹》等明末清初其他幾幅地圖的底本，在版刻地圖史上具有承上啓下的地位。這幅地圖對於研究明代後期國家經濟、地理沿革、地理學思想以及大幅版刻地圖的刊刻出版都有很大的價值。根據這幅地圖，我寫出了論文《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圖書館藏〈九州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迹〉》，並在 UBC 歷史系“中國研究小組”的會議上發表，引起了老師、同學以及從香港、臺灣前來訪問的學者們極大的興趣。

我的博士論文將以明清批校本為中心展開，UBC古籍特藏中還有數量巨大的批校本，它們都可以為我博士論文的寫作提供非常重要的一手材料，是我的研究所必需的。像我一般享受近水樓臺之便的，還有歷史系的碩士研究生馬奏旦，他說：

我的碩士論文是關於明代遼東軍戶生存策略的研究，因此需要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眼光，來書寫群眾的歷史。這種視角要求大量的基層材料，以便獲得更多的歷史細節。論文的原始資料主要依靠的是UBC亞洲圖書館所藏的《明代遼東檔案匯編》。該資料匯編包括明遼東都司及其所屬衛所檔案八百八十餘卷，山東等處備倭署、山東都司及明兵部檔案二百餘卷，累計一千零八十餘卷。檔案年代起自洪武，訖於崇禎，以嘉靖、萬曆兩朝數量最多。內容分軍事、民族、馬市、驛站、賦役、司法、民政、官吏等類。其中，司法一類所刊諸件，多涉刑名錢穀等細事，兩造、情節多有具體描述，為個案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支持，也影響了我論文的寫作風格：整篇便是由多個小故事組成，以展現當地軍戶應對王朝統治的應對策略的多個面向。

《明代遼東檔案匯編》是原始檔案的點校選本，因此免不了疏漏。譬如，該冊有將同一事件的百戶呈文與指揮批文割裂開，置於不同標題下的情況。鑒於此，便有必要將點校本與原檔進行比對，以杜缺漏。遼東檔案影印原檔，全部收入《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四編中，UBC亞洲圖書館有藏，使用便利。第四編為明代遼東問題檔案，共有七百一十件。主要是洪武至崇禎年間，明代遼東都指揮使司所屬二十五衛與安樂、自在二州，以及明中期後設置的遼東經略、巡撫、巡按、總兵等衙署的檔案。《總匯》第二編為簿冊類，共收錄明朝檔案一百零二卷，其中主要是